



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 传播治理

邱鸿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 传播治理

邱鸿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传播治理/邱鸿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161-9884-1

I. ①环… II. ①邱… III. ①传播媒介—研究—中国
IV. ①G21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138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206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2012年我开始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工作，申请到的第一个研究资助就是关于环境传播的课题，从此形成了路径依赖，至今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已有四年。基本上每个假期我都会安排一次田野调查，陆续考察过上杭紫金矿业、宁德核电站、漳州古雷PX、云霄核电站等项目周边的环境风险与当地公众的风险感知，以至于想当然地以为自己都快比一些福建籍的同事更了解福建了。而且闽南的海岸线之壮美、坚守传统与信仰之虔诚、历史遗产与自然物产之丰富，令我这个异乡人产生了深深的认同与归属感。

考察过的这些地方都这么美好，但都存在人为的环境风险。2015年4月6日古雷PX再次发生安全事故，我再次来到与之隔水相望、曾发动群体事件反对PX项目转移到古雷的东山县铜陵镇。巨大的烟柱沿着东北风的方向跨过海湾，笼罩在关帝庙景区的上空。当地刚刚下过“黑雨”，一些居民不敢吃露天种的蔬菜，超市的鸡蛋被抢空。我以为居民们都是忧心忡忡的，不承想一位渔民指着古雷的方向，用极其勉强的普通话告诉我那边爆炸了，他和他的邻居很高兴。我一愣，随之醒悟：他们并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因为爆炸证



明了他们当年的激烈反对不是非理性的，而他们的行为却被贬称为自私自利的“邻避”。当年夏天我站在古雷半岛的杏仔村码头，那里仍然碧海晴空、水清沙幼，留守的渔民在烈日下忙碌着，将从附近海域捕捞上来的海胆与带鱼从船舱搬上码头。然而他们背后的家园却已经倾圮在瓦砾堆里，不远处的PX装置在爆炸事故后仍处在停产状态，排污口附近漂浮着染成黑色的废弃鲍鱼网箱。两次爆炸，以及不堪粉尘与异味的困扰，村民们被迫答应放弃物阜民丰的家园。他们也曾经抗争过，拒绝征地、堵厂堵路，但他们的声音几乎没有被外部世界听到过。柏拉图说“会讲故事的人统治世界”，当地方官员或产业倾向的记者搬出新加坡裕廊等地的成功案例试图说服公众接受风险项目时，这些讲故事的人也许真的相信在本土能够复制化工厂与居民区鸡犬相闻、相安无事的和谐景象。可是，为什么在古雷我看到的却是工厂爆炸与环境移民的结局？一位好友曾经在她的小说题记中引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人对人是负有责任的。”作为传播现象的研究者，需要追问在此过程中，为什么异地公众、新闻媒体与风险决策者未能倾听他们的声音？社会传播系统出了什么问题？如果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倾听，这里又会是何景象？

在这几年的田野调查中，我一直试图去回答这些萦绕脑海拂之不去的问题。在风险传播的研究框架内解答上述问题，至少需要考察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方面：首先，公众如何感知风险，影响他们风险感知的因素是什么，其中哪些属于传播的因素；其次，公众通过何种方式将自己对风险的态度传递给社区、媒体以及风险决策者，后者又是如何回应的，在这过程中存在什么传播障碍；最后，如何针对影响利益攸关方互动的传播体制、传播关系、传播规范、传播



渠道、传播内容、传播模式、传播机制进行有效的治理，促进他们基于商议做出环境决策、解决环境争议。这些都不是单一的研究方法与“一张安静的书桌”就能够解答的，而是需要深入现场去做田野调查。记得在云霄县城调查公众的核电风险感知时，我们边做深度访谈边做问卷预调查，一位手机店店主拒绝回应“每月补偿多少您能够接受核电风险”这道选择题。在我们的追问下，他解释说，当地居民消费有限，生意不好做，同时实体商贸又饱受电子商务侵蚀，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所以理性上说每月补偿 500 元对他来说都具有诱惑力，然而从情感上说他却难以接受用这几百元换来核电风险。如果不做田野调查，就无法了解个人化的风险体验，也无从知晓有时看似中性的问题会无意间伤害受调者的自尊，而且最终会把这样的答卷当作一份废卷或者一个缺省数值来处理。

然而由于语言障碍，在闽南地区做田野调查殊为不易。信任缺乏、农村文化程度的制约以及课题的敏感性，也常常使得调查举步维艰。在东山调研环境群体事件的动员机制时，虽然事隔多年，仍有受访者害怕受到惩罚而忌讳谈及自己或邻居的经历。在古雷杏仔村的废墟中我独自搜寻拒绝搬迁的居民做访谈，在屋内受到冷遇后尴尬地走出屋外，暴露在盛夏正午的骄阳与海风中。此时我情绪沮丧，暗暗责问自己为什么不选择在城市的空调房里做调研却要来到这里。可是也有时候，我会遇到真诚坦率的倾诉，让我感慨他们的境遇之余，同时觉得自己的命运跟他们密不可分，因为对于环境不正义，没有人可以是无辜的。有时候我会惊叹在一个小县城甚至小渔村所遇到的见识不凡、微言大义、不甘命运受控的普通人物，这个社会没有任何理由忽视他们的声音。我们在倾听他人时获得尊重，

同时也发现了行走荒村陋巷的意义：倾听受风险影响者被边缘化的声音，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将它转述给社会，给风险决策者，试着去改变风险传播的向度。逆风而行，便是我们将受影响者的风险感知作为研究起点的价值所在。

本书收录了2013年以来陆续发表的七篇期刊论文，又增加了基于对漳浦县古雷镇（2015年6月）以及对云霄县县城与列屿镇（2015年10月、2016年1月）的田野调查而写成的两篇论文，随后以环境风险社会放大的传播治理为主题，按照治理主体的类型整合这九篇论文，最终形成了由“媒介”“公众”“政府”三个部分有机构成的主体框架，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第一部分聚焦大众传媒与网络媒体在环境风险的建构、传播与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一章基于美国经济学家安东尼·唐（Anthony Downs）的“议题关注周期”模式，考察美国主流报纸在2000—2013年间对中国环境与中国回应气候变化的报道轨迹，从报道量变化及其背后的激发事件反映美国媒体建构的中国环境形象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回应气候变化议题在此期间经历了完整的媒体关注周期，现处在“后问题阶段”，而对整体中国环境的媒体关注还处在上升期。在此过程中北京被建构为中国的污染中心，中国被描述为全球气候变化的症结。研究进一步讨论了偏颇的媒体建构背后的内生与外生因素。

第二章以气候变化议题为着眼点，关注网络社交媒体上的环境倡导与网民评论对公众风险应对行为的潜在影响。“适应”与“减缓”已经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战略，倡导公众行动对前者尤其关键。然而对新浪微博的内容分析与框架分析发现气候变化主



题微博以“减缓”为主导框架实施公众倡导，“适应”框架处在话语秩序的边缘，作为重要信源的主流媒体同样忽视“适应”战略。作为低度风险感知的表现，网民以冷漠、悲观、宿命论，甚至批判性与偏离性话语来回应微博上的行为倡导。借助吉姆·维特（Kim Witte）的“延伸的平行处理模式”，本章探讨网民轻视气候变化风险的心理机制与影响因素，并从激发公众的应对效能与自我效能出发，对气候变化的风险传播治理提出建议。第三章将目光转向新闻媒体对国内环境风险的表征，使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探讨PX项目从厦门迁至古雷后，媒介PX话语秩序的变迁及其社会影响。位于漳州古雷的腾龙芳烃又称古雷PX，是2007年厦门民众抵制以来我国唯一新建投产的PX项目。然而2013、2015年的两次爆炸最终掀开了遮蔽在企业违规、官员渎职之上的面纱。从厦门市民驱退PX项目到古雷居民整体搬迁成为环境移民的过程中，媒介的PX话语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报道框架改弦更张为地方政府公关应对公众抵制的框架，经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支持话语秩序变迁的重要动力。与之相对应，厦门市民被塑造成理性公民形象，而古雷居民不仅合法诉求受到新闻遮蔽，而且在为数不多的报道中被建构为沉默的受害者与贪婪的环境移民。缺乏媒体话语与公共舆论支持，古雷居民没有实质性的筹码去监督企业合规运作、促使地方政府履行监管职能，最终撤离赖以生存的家园，生计面临不确定性。古雷PX爆炸宣告了通过政府公关解决“什邡困局”路径的破产，促使传媒机构省视新闻话语的社会影响。

从媒介视角转换到公众视角，第二部分聚焦公众的人口学特征、环境价值观、社会信任与政治效能对其风险反应的影响。第四章基



于2013年宁德核电站商业运行前夕对其周边居民的调查，探索居住区域、性别、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对环境关注度与风险接受度的预测效应以及相应的传播治理措施。研究发现高学历者比低学历者更关注环境，且更倾向于拒绝核电风险与反对“邻避”。然而性别而非教育程度对居民通过“散步”表达环境关切的行为倾向有预测效应。这说明在我国，以拥有高学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为主要特征的“新阶级”是环境运动的支持者却不一定是积极行动者。由于环评专家对“新阶级”的风险判断影响最大，地方政府应将构建专家、政府与公众互相倾听、对话的公共领域作为针对这一人群的传播治理战略。

第五章试图回答在我国地方政府的环境传播战略中，公众信任是否应该继续扮演关键角色这一问题。对福建上杭紫金矿业周边居民水污染风险感知的调查显示，当地居民在环境风险议题上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城乡网络使用率的差异对公众信任差异有较为显著的预测效应，然而公众信任并不足以显著影响居民对水污染风险的接受度。城乡居民特定的网络使用行为（即利用网络获取当地环境信息与了解异地环境冲突事件的程度），并不影响公众信任，却对风险接受度有显著的预测效应。研究认为，将信任重建作为水污染风险传播的目标在短期内并不现实，地方政府相应当有序公开环境监测数据，辅助居民理性评估风险。

第六章探讨公众的风险感知与风险应对行为之间存在的鸿沟，试图理解公众为何放大环境风险却在风险应对与环境参与上表现出行为上的消极。对云霄核电站附近公众的深度访谈发现政治效能是认知—行为鸿沟之间的中介变量。即便在互联网、智能手机与社交

应用软件普及的今天，公众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身能够理解风险并参与风险决策（内部效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风险管理者会积极回应公众的环境与健康诉求（外部效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集体合力能够达到想要的目标（集体效能），决定了他们是否会使用网络积极地寻求知识、表达诉求，以及介入风险应对行为。本章还讨论了公众内部效能、外部效能与集体效能形成的机制，以及不同类型效能的组合对转型社会未来风险治理的影响。

第三部分将视线投向作为主导风险决策者与管理者的地方政府，它在多大程度上倾听公众的声音作为风险决策的依据，对民主的风险传播与治理起到关键作用。第七章采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罗杰·卡斯帕森（Roger Kasperson）等人提出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考察2007年厦门PX事件中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因素，揭示异地媒体的不平衡与戏剧化表征以及网民对PX的污名化与语境化是公众放大环境风险的重要机制。环境风险评估由传统的技术模式转向包容公众风险感知的文化—经验模式将是未来趋势，地方政府的环境传播战略也应做出从技术模式到文化模式的调整，促进技术公共领域、大众传媒公共领域以及公众—专家—政府的商议性公共领域的发展。

2008年年初，厦门PX项目即将转入漳州古雷的传闻并未引发古雷民众的抗议，却在一水相隔的东山县铜陵镇触发了环境群体事件。第八章与第九章均聚焦古雷—东山跨区域环境风险，分别通过质化与量化研究方法，探讨产业转入地环境群体事件的动员机制与跨区域环境风险的传播治理。第八章通过深度访谈与话语分析，发现地方利益集团的社会动员强化了公众的高风险感知；而地方媒体、

学校、居委会的说服传播没有回应公众的环境正义诉求，同时部分组织成员对组织规范与使命的心理抵制也降低了组织传播效力，从而未能有效减轻公众的风险感知。

第九章以东山县铜陵镇为问卷调查点，进一步验证当地公众的环境正义意识对其风险反应的预测效应，以理解政府风险传播未能阻止当地环境群体事件发生的原因。结果证实程序正义意识对公众是否接受风险、支持“邻避”，以及通过“散步”表达环境诉求均有显著预测效应。产业转入地的公众常常采用环境正义框架去理解来自发达地区的环境风险，而地方政府却使用技术安全框架对公众实施风险传播，传播障碍往往由此产生。研究结果意味着产业转入地政府的风险传播应优先回应公众的环境正义诉求。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被引入社会科学并逐步取代“管制”（regulation）成为风险研究的主导理念。治理是指政府与非政府行为者参与集体决策的结构与过程（Nye & Donahue, 2000）。在风险研究领域，它倡导政府机构、市场力量、公民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对风险的评估、决策、控制、监管、传播，以减小风险的强度与概率，或使它维持在可控水平。本书关注媒介、公众与政府机构在风险传播治理中的角色，尚未充分涉及企业、环保组织、科学团体等治理主体，有待今后进一步探索。我的同事吴胜涛助理教授参与了本书第五章的数据分析与撰写。熊慧助理教授以及翁苏伟、杜凯健、陈婧、黄小芳等研究生参与了云霄、上杭、东山、宁德等地的田野调查。厦门大学学生陈若频、钟伟林、刘新祥、王丽珍、王超，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学生蔡林玮、谢小静等参与了问卷调查。衷心感谢他们的付出。

目 录

第一部分 媒介

- 第一章 媒介与国家环境形象建构 3
- 第二章 媒介与气候变化适应战略 21
- 第三章 媒介与PX 话语秩序变迁 43

第二部分 公众

- 第四章 新阶级、后物质主义与风险传播 95
- 第五章 网络使用、公众信任与风险治理 114
- 第六章 社交媒体、政治效能与风险介入 132

第三部分 政府

第七章 环境评估模式变革与传播治理	183
第八章 环境群体事件的组织传播机制	202
第九章 环境正义与跨区域风险的治理	221
附 录	243
参考文献	249

第一部分



媒 介

第一章

媒介与国家环境形象建构

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 1971）认为社会问题与其说是客观条件，不如说是集体定义过程的产物。在此过程中交谈、传播、话语对公众与政治关注起到了关键作用（Hansen, 2010: 14）。随着我国环境与发展矛盾的加剧，西方主流媒体加大了对我国环境议题的报道力度，向全球公共领域呈现了一张生态维度的中国侧面像。建构主义的视角不仅质疑侧面像的失真度，还追问以下问题：为何某些环境议题与主张被媒体赋予了特殊的显著性？媒体关注的倾向与力度是持续的还是周期性波动的？如果答案是后者，驱使媒体关注周期性变化的动力是什么？通过对媒体关注轨迹的历时性考察是否可以预测未来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环境的趋势？本章采用美国学者安东尼·唐（Anthony Downs, 1972）的“议题关注周

期” (issue-attention cycle) 模式作为考察上述问题的路径。这一模式过去多被用来揭示本国媒体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变化，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美国主流报纸的中国环境形象建构还是一个崭新的话题。

一 文献回顾

1972年唐氏在他的“种子”论文《生态问题的兴衰——“议题关注周期”》中，以第一代环境问题（空气与水污染）为例，指出美国公众很少持续关注某个重要的国内社会议题，相反有一个“议题关注周期”。这个周期由“前问题阶段”“问题惊现与欣快的热情”“认识到重大进展的代价”“公众兴趣的逐步消退”以及“后问题阶段”构成。他认为，产生关注周期的原因：一是特定问题本身的属性；二是传播媒介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方式。经历关注周期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以下属性：（1）受特定问题困扰的往往是社会成员中的少数，这意味着他们的遭遇最终会淡出多数公众的视野；（2）问题的根源是有利于多数人或者权势群体的制度安排，意味着它的解决最终需要制度的根本改变，而这种改变又是相当困难的；（3）问题没有内在的令人兴奋的特征，意味着新闻报道会很快令多数公众厌倦，当媒体意识到公众兴趣衰减后会转移报道焦点。

唐氏认为公众对解决环境问题的热情既受到自身生活水准提高又受到媒介警示性修辞的激发；反过来由于美国媒体几乎都是受众—利润导向，公众通过维持或丧失对特定议题的兴趣影响媒体关注。唐氏赞同麦克卢汉所说的总体上是受众在“管理新闻”，似